

钟荣光与岭南农科大学

罗兴连

内容提要:

钟荣光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他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对岭南的农科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岭南农学院的前身——岭南农科大学的创立及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岭南农科大学作为岭南大学的分科大学之一,是在岭南大学原有农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完全由华人董事局独立管理和经营的农业专门学校,它在培养农科专门人才、促进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岭南农科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第一位农业传教士(Agricultural Missionary)高鲁甫(G. W. Groff)在广州岭南学堂教授农学,筹备农场,实行试验。高鲁甫在岭南大学的农业实践为此后岭南农科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钟荣光则是岭南农科大学的直接倡导者和推动者。岭南农科大学创立于1921年,1927年8月随着岭南大学正式收归国人自办,岭南农科大学改为农学院,并入岭南大学。岭南农科大学从创立、经费维持到规模的扩大等方面都离不开钟荣光的支持与推动。

一、钟荣光与早期岭南农科

钟荣光,字惺可,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原是清代举人,1866年9月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小榄镇的钟家巷,其父玉龙最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经商。钟荣光自小随父亲到香港读私塾,之后回到广州就读大馆,曾随岭南国学家、学海堂学长吴道镕学习。早年的钟荣光由于父兄师长“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的思想影响而致力于功名利禄的追逐,他16岁中了秀才,27岁中举

人，^{〔1〕}其后在广州设馆授徒。此时的清政府正处于日渐衰败的阶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举国激愤。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人士高举维新变法的旗帜，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的时候，钟荣光却过着“吹大烟，立侍妾，花天酒地”^{〔2〕}的旧式士大夫生活。

直到1899年，钟荣光在香港道济会堂受洗为基督教徒后，一改往日放荡不羁的生活，所从事的职业、经历的生活及整个人生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3〕}在这之前，钟荣光受着时代风潮的刺激，与革命志士陈少白、郑士良等结识，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于1896年加入了兴中会。钟荣光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为开启民智，他先后办过《博闻报》（后改名为《安雅报》）和《可报》，并为《课艺日新报》、《文坛报》等撰稿。他与教会人士左斗山、区凤墀、杨襄甫等结识之后，遂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899年接受了洗礼。此时的他深感要救国救民非学西方先进科学不可，遂转而从事教育事业，这也是他此后致力于农业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899年钟荣光被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聘为汉文总教习，到1937卸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近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教育救国是其始终坚持的理念。在他看来，“建国如建屋然，在旧屋未拆毁之先，必规定新屋之图则，但此一般建筑之物料，与工程之人才，又非预备之先，则临时无应用，此建国之所以必先教育也。”^{〔4〕}在国家动荡的时代，钟荣光将教育视为民国建立的当务之急，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视。1912年钟荣光在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期间，大力推行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民主办学方针，对广东省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清代关于学生尊孔读经的规定，并提倡信教自由，下令将清代的科举试场改为公共体育场，并成立了中小学教科书改编委员会，革新教学内容。同时钟荣光力排二千多年来的封建陋规，开创我国教育史上男女同校的先声，并请准省议会通过拨款20万元，选拔男女学生100多人分赴德、美、日等国留学。他还根据我国文盲众多的社会状况，特别重视社会教育，设立图书馆、图书室，并派出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市，宣传新文化和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通过各种图片、幻灯、白话戏、通俗小报、新式通书等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实行阳历，1913年，他下令各校元旦放假二周，春节严禁放假，学生一律上课，如学生请假过半，校长对其实行记过处分，若学校擅自放假，则扣发校长薪俸半月，以此使广州各校一律遵行。^{〔5〕}

重视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以促进中国农业的改良,从而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作出贡献,是钟荣光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体现。钟荣光对农业非常感兴趣,他意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如欲富强,必须先改良农业,而广东省的农业自有其特点,亦急待改良,故岭南大学要造就专门人才,当以农科为主要途径。钟荣光对岭南大学农科教育创办的大力提倡及经费的筹集是此后岭南农科大学(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前身之一)得以继续维持及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岭南大学农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由农学部到岭南农科大学再到农学院的发展过程。1916年,岭南大学的早期农科教育机构——农学部正式成立,其成立和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时任副监督的钟荣光的支持。据曾留学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农业大学,后回岭南教授畜牧学,且参与其事的教师谭锡鸿回忆:1916年春,岭南大学纽约董事局总干事格兰(William Henry Grant)先生亲自到堪萨斯州立农业大学,洽商该大学与岭南学校互相“合作支援”的问题。同年,毕业于该校的罗飞云(Carl Oscar Levine)在其母校学生及教职工的支持下来到了岭南学校,负责岭南草药种植园的植物标本采集等工作。1916年9月3日,高鲁甫召集罗飞云及谭锡鸿三人开了第一次岭南学校农学部教务会议,宣布岭南学校农学部的成立,并对各人的职责进行了分工,由高鲁甫掌管部务及教务,教授园艺课程,兼主持采集植物标本;罗飞云主管乳牛业务并教授畜牧学课程;谭锡鸿主管农场业务并教授家畜鉴别、家禽学和动物学课程。^[6]自此岭南大学正式开始了农业课程的教授,并招收了第一批农业学生。而在此之前,仍在美留学的谭锡鸿就曾致书当时刚刚结束广东省教育司司长一职、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钟荣光,建议岭南大学兴办农业学校,并参照美国天主教堂办理农业专门学校的办法,在广东全省八个区(广府、潮汕、海南、钦廉、两阳、四邑、肇庆、韶州)分别兴办农牧场,以农牧场的收益来作为学校经费的补助。钟荣光对此更是大加赞许,且称之为“百年大计”,可见其对农业教育的重视。

1918年,美国丝业公会捐助一万三千美元为岭南大学建筑蚕桑学院之用,纽约巨商费来(Marcus Fielder)捐建模范缫丝厂一座,同时丝商李令(Atwood Reeling)等又捐建了蚕丝实验室一座,附设蚕卵冷藏库。自此,岭南大学农学院开始致力于中国生丝、蚕丝的生产及养殖方法的改良。钟荣光对农业教育非常重视,他希望在这个领域,岭南大学可以对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生活作出重大贡献。很早以来,他就计

划将岭南大学农科办成一所专门的农科大学，为社会培养专门的农业人才，以改良中国农业。1919年钟荣光就曾建议农学部拟订一个10年农业计划，他深信在实业教育领域建立一所强大的农科大学将有着广阔的前景。^[7]为了筹设农场，实现以场养校的计划，1919年钟荣光亲自勘察了广东省内外包括汕头、漳州、厦门等许多地区。1920年4月，甚至到海南岛进行实地勘察，与琼崖镇守使李根源商议，准备在海南开设农场，并得到其支持。同时，为了使学校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扩建学校农场以供教学及农业科学实验之用，钟荣光劝说省长征收校园附近人的地产，命令附近居民将土地卖给学校，并限期迁坟3000多处。虽然这一作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怒，而学校的农场却扩大到了150英亩，主要用于改良稻米和其他作物品种，培育果树，办奶牛场和饲养牲畜。^[8]

正是钟荣光对岭南农科的不懈努力，1921年一所完全由华人董事局管理的专门性农业学校——岭南农科大学在南国大地上闪亮登场，对今后华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钟荣光与岭南农科大学

1921年，钟荣光以广州市政府参议会参议员的身份呼吁省府支持岭南农科大学办学，得到当时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首肯，但必须以岭南农科大学将来应作为广东大学的一部分为条件，并由省政府拨款30万元作为开办费。从1921年起，每年由省府补助经常费10万元。又由粤港沪巨商李煜堂、马应彪、陈廉伯三人，及省教育行政委员陈宗岳，岭南同学代表钱树芬共五人组成一独立的华人董事局，负责管理岭南农科大学事务。

岭南农科大学是在岭南大学原有农科的基础上，“展拓岭南大学原有之试验场为总场，并陆续设立试验分场，以推行农学知识及经验于各处中小学学生，及乡村农民。务使物产增多，人民富民，以济我国之困。”^[10]

岭南农科大学成立于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连年的军费开支导致政府的补助无法如期拨给，从而给岭南农大的正常运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学校的财政困难，使这所由华人董事局独立管理和经营的高等农业专门学校得以继续维持下去，钟荣光

表一、岭南农科大学董事一览表^{〔9〕}

陈廉伯	广东丝业代表、广州总商会会长
李煜堂	广东银行总监督
马应彪	港沪粤先施公司总监督
陈宗岳	广东教育委员会会长
钱树芬	广州市大律师
董事局总干事 李士瀛	留学美国毕业生
岭南大学行政部代表钟荣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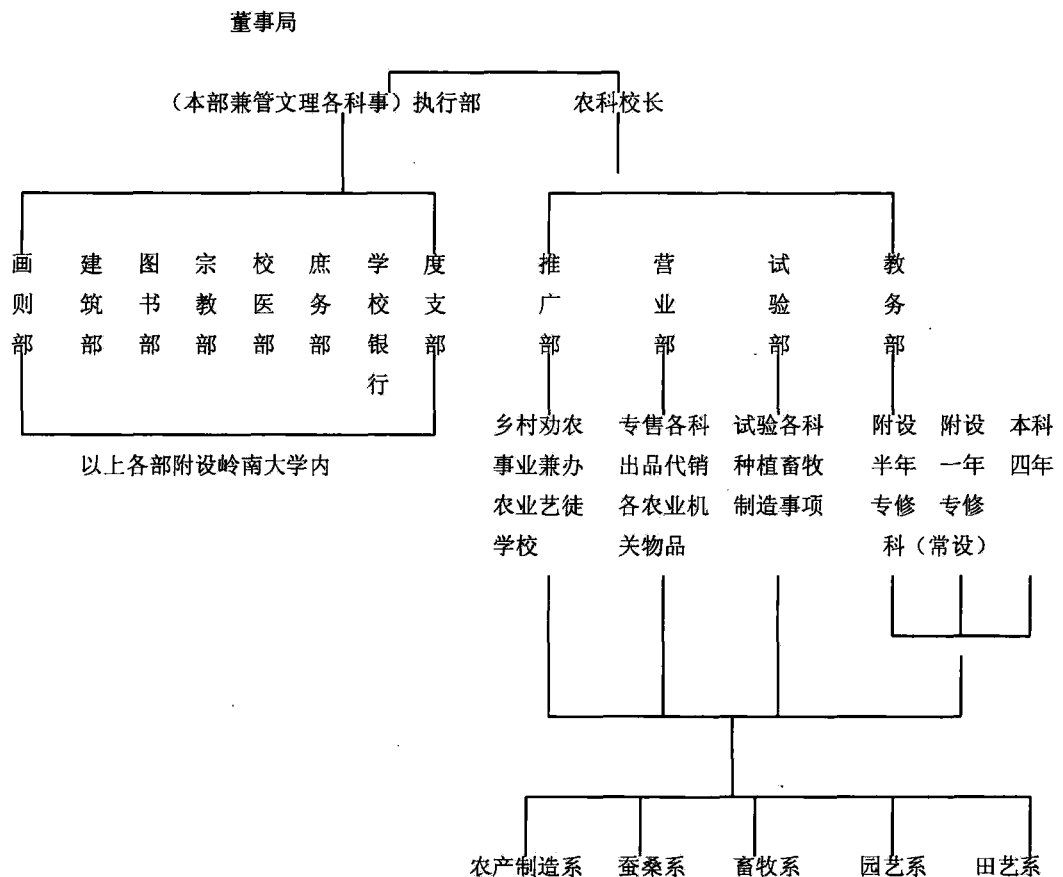
又继续奔走于南北美洲及南洋地区，极力向海外华人劝捐，共募得二十五万元捐款，以开办农科之用。1923年又在仰光募得款项建筑农大教职员住屋四座，共港银三万六千元，钟宝璇在檀香山也募得美金六千余元。^{〔11〕}时值艰难时期，钟荣光的筹款也并非一帆风顺，1922年他偕林建中赴南洋筹款时，被萧佛成诬陷为陈炯明党，称其代陈炯明到南洋募捐。1923年，为筹办潮州农场事于南洋募捐，也只得一万余元经费，与原计划募捐十五万元的数目相差甚远。^{〔12〕}尽管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缓解了学校的财政困难，使之得以维持发展下去。

岭南农科大学在从成立至1927年改为农学院并入岭南大学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虽然历经政局动荡、学校财政困难的艰难时期，但在教学、科研和推广方面仍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一）岭南农科大学的教学与管理

岭南农科大学经岭南大学董事局的同意另组华人董事局负责管理全校事务，董事局中设立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司库兼书记一人，并聘任总干事一人，受董事局指挥办理一切经济事宜及进行事项。岭南农科大学华人董事局有监督和计划农科及大学的全权；有议决农大全年预算及稽核的权利；有任免农科大职员教员的权利及担负维持农科大学经济及进行的职责。《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条例》中规定了董事局董事的人数最少必须有五名，最多则不能超过十一名，且规定董事中如有人去职，其职位空缺必须由董事局来物色合适的候补人，并于常会或特别会时投票选充，“惟须得岭南大学董事部之承认，岭南大学监督或副监督及本局总干事均得列席会议。”^{〔13〕}

岭南农科大学共分为教务部、试验部、营业部及推广部四大部，并设有田艺、园艺、畜牧、蚕桑和农产制造五个系。其组织管理系统可见下表：

表二、岭南农科大学之组织^[14]

在钟荣光领导下，岭南农科大学广揽学术人才，并注重学术研究，使其因拥有较高的师资力量而在近代华南农业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岭南农科大学任教之师资均为学问高深，经验丰富之人员。如担任校长且兼农场主任及园艺科主任等职的外籍教授高鲁甫主持农大试验部的美国堪萨斯州立农业大学农学硕士罗飞云以及负责推广部的本国教授傅保光等。从1922年起，不少岭南初期农科毕业及留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也都纷纷为学校所罗致，如古桂芬、杜树材、黄泽普、何亮、容秉衡等人，都留在农大任教。

岭南农科大学设本科学制4年,学生共需修满141个学分才能毕业,学校章程还规定三、四年级的高级课程必须包括主修科30个学分和辅修科12个学分。学校的课程除了由文理学院提供的普通文理课程之外,还设置了20多门农业专业课程,其中包括了一门农学、5门畜牧学、4门农作物学、1门农业器具学、2门农场管理学、1门森林学、4门园艺学、2门农业灌溉学、1门动植物繁殖学和2门土壤学等课程。

1924年,钟荣光在美洲为农大扩充事募捐的演讲中指出:“岭南农校所以须待扩充,其主要目的为:(一)造就高等农业人才,(二)养成中小学农业教员,(三)对乡村农人传播农业知识,(四)与世界各国交换研究成果……。”^[15]然而每期一百多元的学费,对大多数当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子弟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加上他们本身的知识准备不够,因而进入大学接受高等的农业教育多是富家子弟。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履行农大创办的宗旨,更加广泛地向乡村的农民传播农业知识和技能,改善农民生活,岭南农科大学在设置四年制本科之外,还附设有农业一年专修科和六月蚕业短期专修科,以适应广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921-1922年就招收了18名预科生和18名本科新生,报读蚕业短期专修科的也有14人。1922年4月,顺德县长特派该县十余名学生到农科就读蚕业短期专修科,10月28日,岭南农科大学举行了蚕业短期专修科的第一次毕业典礼,由高鲁甫校长给十一名学生颁发了六月短期专修科毕业证书,典礼可谓极引人瞩目。^[16]顺德蚕丝生产为广东之冠,其蚕丝生产直接影响着南中国蚕丝业的发展,此次学校与政府合作的成功也为初创中的岭南农科大学增强了继续发展的信心和动力,甚至有了将来多设各种短期专修科,如牛奶科、罐头科、畜牧科等的设想。岭南农科大学蚕业短期专修科的设立,实是适应广东丝业改良的需要,对华南蚕丝业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岭南农科大学在农业教育方面为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高级农业人才,从创立到1927年作为农学院并入岭南大学为止,共有本科毕业生20人,^[17]分别任职于学校、政府农业机构及各农产公司,为华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二) 岭南农科大学的科研与推广及其对华南社会经济的影响

岭南农科大学为实施实用教育和农事试验,由政府按公用征收之例,命令圈购了岭南大学附近之山地做农场之用,将校内旧有的数百亩农场扩充到千余亩,其中分设

有廿余亩种棉试验区、四十亩各项果木试验区、百亩种桑试验区、四十余亩禾稻试验区、十余亩茨菇、莲藕试验区以及蔬圃、苗圃百余亩等。这样一方面使农大得以就近与岭南大学各科联络，另一方面也为农大教授科研和学生农事实习提供了便利的场所。1923年，通过钟荣光、林建中在南洋地区募得的捐款，岭南农科大学又在潮汕地区建立了占地二万多亩的分场，使学校的规模得到了扩充。

农业研究是一门实践性相当强的学科，岭南农科大学根据广东农业发展实际，重视农业改良和推广，其试验研究工作按各系办理。农艺系的研究专注于稻种、豆科作物及甘蔗的改良，1922年学校专拨四十亩田地以供种稻之用，进行选种、育种等试验，经过多年来研究成功之多穗水稻，早造的有400种，晚造1100种，^[18]特别是农大教师傅保光对油粘、竹粘、银粘、东莞白、及早稻、布地白等十多种稻谷进行研究试验，采用菲律宾的“株行制”方法改良稻作，以增加产量。1925年，岭南农科大学所改良的晚造米产谷一万二千零六十八斤，在当时值银七百七十元零八仙，^[19]可称得上是一大成功之例证。同时农艺系还对土洋肥料的研究尤为着力，曾与美国西奈公司合作运用该公司生产的亚摩磷（Ammo Phos）肥料进行水稻施肥试验，以提高稻作产量。在畜牧研究方面，岭南农科大学专辟有乳牛场、猪场、鸡场，开展品种改良和品质试验研究及病理研究工作。畜牧科由罗飞云主持，其设立之宗旨在于“供应全校以畜产及利用其一切设备以供研究之用，至其对于其进种事业，是欲对于中国畜牧一途有所贡献”。^[20]除了输入外国霍士丁乳牛等牛种外，畜牧系所研究的奶水牛杂交育种也获得了成功，同时在牛酪制造、养鸡、种植牧草，以及家畜疾病防治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于园艺方面，由校长高鲁甫和张卓堃负责，系内又细分为蔬菜、花卉、果树、种籽、苗圃、植物标本室六股，分别由张卓堃、邵尧年、郭华秀、傅保光、袁汉邦、高鲁甫六人主理各股事务。岭南园艺一科创设较早，输入洋种花蔬果木，功劳甚大，因而对于广东本省及华南各省菜蔬花果的种植贡献非常大。除了高鲁甫所致力荔枝种植与繁殖研究外，园艺系还大量地在岭南引进夏威夷木瓜及其他东南亚果木新品种，并进行柑桔改良试验，给广东省的新兴农业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农业制造乃是农业教育中的一种新事业，该科主要专注于罐头、墨水及肥皂之制造，规模虽小，而成绩颇佳。特别是罐头制造一举，可为农大自养之有效途径之一。

蚕丝业是广东的经济支柱，因而蚕丝的改良也为岭南农科大学所格外重视，其研

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在农大成立之前，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考活（C. W. Howard）针对广东生丝因蚕农生产方法和技术落后及蚕病影响而质量不好的情况，开始着手对蚕种选择、蚕病防治及蚕丝生产技术改进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帮助改良广东蚕丝。1918年，在广州的英、法等国丝商等与广东商会“广东丝业研究所”共同组织了“广东省万国丝业改良会”，岭南大学被邀请入会，从而促使岭南大学相应地设立了“蚕桑科”，承担起改良蚕种的职责，由生物系教授考活兼理改良蚕种事宜。从此，蚕桑学成为岭南农业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1919年美国丝业会（American Silk Association）为岭南大学蚕丝研究捐助房屋和学生宿舍各一所。此外，又获得了尤金·亚特伍德和爱德华·布拉德里捐赠的亚特伍德抽丝实验室一座，该实验室包括了一个实验缫丝场和一个冷藏库，使蚕籽能够安然过冬。为了推广良种进而扩大生丝原料的供应，蚕桑系将运用新法改良出来的无病优良蚕种分送给顺德县容桂、南海县九江、中山县小榄等地的蚕农饲养，成绩良好。岭南农科大学通过新法制造的蚕纸由于蚕籽孵化齐一，蚕儿健壮，且蚕儿成熟时条条都能结出大而均匀的蚕茧而颇受蚕农的欢迎。因此，岭南蚕纸在蚕农中的信誉非常好，甚至出现蚕农抢购岭南蚕纸的现象，从而使免疫蚕纸在顺德容奇、桂州、大良、勒流、乐从，南海的九江、官山，中山的小榄等地的推广成效显著。

1921年岭南农科大学成立，蚕桑科并入该校，“仍继粤省万国丝业改良会之初志，而从事研究。”^{〔21〕}考活辞去了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之职而专任农大蚕桑科主任，教师黄泽普则兼理育蚕制种事宜，助理李威士负责蚕种营业兼推广，助理员欧阳炎负责栽桑。1923年7月，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鉴于岭南农科大学蚕桑科蚕种改良卓有成绩，特拨给该科港银5000元进行研究，对南中国蚕丝业进行系统地调查，并设“广东全省改良蚕丝局”于岭南农科大学蚕桑科内，负责广东全省的蚕丝改良工作，考活被委任为第一任局长。从是年8月至11月，在考活的主持下，布士维、黄泽普、周秉钧和黄永安四人参与了对广东和广西32个县的蚕丝业的考察工作，后由考活用英文编写成《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该报告系统地记载了两省种桑育蚕的技术、蚕农的生计、制丝业、生丝贩卖、水结及茧壳、丝织业、野蚕丝等各个方面，并提出了发展和改良广东蚕丝业的意见，是不可多得的蚕丝业研究文献。

岭南农科大学的推广工作有专门的推广部负责，通过开办展览会和演讲等方式向

农民宣传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推广农大科研改良成果。在成立之初，推广部与营业部联络劝广东农民栽种木瓜，并将培育的新种木瓜秧分发给附近的农户栽种。与政府合作设立广东省蚕丝改良局，在顺德、乐昌、中山等县设立推广办事处，派员常驻，指导蚕农，耕种桑地和改良饲养方法。此外，岭南农科大学还创办了《农事月刊》和《岭南科学杂志》（*The Lingnaam Science Journal*）等刊物，专载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农业改良新法，甚至对农产及各种货物的市价进行调查，在《农事月刊》上登载以告农人，使其熟谙行情。

岭南大学《岭南科学杂志》的创办始于1922年底，原名为《岭南农事半周刊》（*The Lingnaam Agricultural Review*），每年出版一卷，每卷两册。1927年，由于传布的范围得到了推广，出版的数量改为每年四期，并改名为《岭南科学杂志》。该杂志为英文版，以“促进中国科学之进步，奖进独立研究之兴趣及宣扬科学为宗旨。”^{〔22〕}上面一般刊载有关农艺、园艺、畜牧、植物学、微菌学、农村经济、人类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方面的专著，书报介绍及评论，国内外科学消息，岭南大学教授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内容，是一本内容相当丰富且具学术性的刊物。成为岭南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向国内外的推广的不可多得的媒介。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协调

岭南农科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华人董事局独立管理和经营的农业专门学校，虽然从成立以来，校长一职十多年来一直由高鲁甫担任，但是高鲁甫希望通过农业教育来传播福音的理想却不得不受到限制。教会只能对岭南农科大学实施间接的控制和影响，特别是在钟荣光担任岭南大学校长之后，岭南大学的主权完全收归国人所有，岭南农科大学也作为农学院并入了岭南大学，西方教会对岭南的控制也随之渐渐减弱。

钟荣光是一位讲求务实的爱国教育家，在岭南成立完全由华人自己管理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是他的宏伟计划。他在给美国芝城青年会的演说中提到：农科大学“完全由华人与政府所办，”目的在于“一面在养成实用人才，一面在改进农人生活，将来各大农场，在各属分设小农场，再由各农场附设农村学校，以改造农业。”^{〔23〕}将岭南农科大学作为“收回岭南之第一步”^{〔24〕}是岭南农大组成独立华人董事局，由华人与

政府合办之深意所在，也是钟荣光高瞻远瞩之体现。

钟荣光在南洋和南北美洲的募捐中，一再强调岭南农科大学由华人自办的性质，然而面对这一存在于岭南大学校园内却又独立于岭南大学之外的教育机构，虽然得到了美国纽约岭南董事局的同意，但这一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据说美国纽约的岭南董事局起初并不支持岭南农科大学的创立，^[25] 岭南农科大学是在钟荣光先生的极力坚持与组织筹划下成立的。笔者虽然在查阅的农学院所有中英文档案中没有看到有关岭南董事局不赞成钟荣光创办岭南农科大学的明确记载，但从维持一所农科大学所需的庞大经费来看，当时的岭南大学受一战的影响，又由于美国 1917 年 4 月对德国的宣战而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刚刚成立不久的文理学院尚维持艰难，美国岭南董事局自然不愿挪出多余的经费及人员消耗在办理农科大学的事情上。在华基督教高等院校协会对创办农业学校也持保留态度，根据杰西·格·卢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年）》一书中所提到的“在华基督教高等院校协会认为农业学校的费用太高，而文理科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因此建议教会大学仅保留一所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广州只能创办初级农业学院”^[26] 的主张，美国岭南董事局不赞成钟荣光大费周章地成立一所专门的高等农业学校也是可能的。

此外，我们还能从保留下来的有关岭南大学的中英文档案文献的个别细节中找到一些反映这种冲突的蛛丝马迹。在岭南农科大学的所有中文布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完全由华人独立管理与维持的特点，其英文名为 Ling Naam Agricultural College 或 LingNan Agricultural College (L. N. A. C.)，也完全与任何一所在财政收支、行政、教育管理等方面都完全独立运作的大学无异，然而在岭南农科大学 1922 年 11 月 2 日修订的英文章程中却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的“完全独立”管理实际上也是有限度的，岭南农科大学与岭南大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章程的英文名“Proposed revised By-Laws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as amended and adopted November 12, 1922”，即“1922 年 11 月 12 日广州基督教大学（即岭南大学）之农科大学董事局章程修订建议”，由此可见，岭南农科大学仍是美国纽约岭南董事局所属岭南大学间接控制的一部分，类似微妙关系在章程中“目的”一栏中也有体现。该章程指出“岭南大学之农科大学（即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的目的，是在岭南大学纽约董事局的批准下将已存在的岭南大学农学系（院）改组成一所将维持最高水准的有效地

农业研究和实践的完整的农科大学。”^[27] 同样《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条例》关于命名一条也提到“岭南大学之农科大学准本条例之认可命名为岭南农科大学（英省文为 L. N.A.C.），并为岭南分科大学（本命名倘经岭南大学及农科大学两董事局之同意或有更改）完备份子之一。岭南分科大学内所有一切农学之教授及农业设施之进行均由本农科大学办理，但本农科大学学位由岭南分科大学发给（自后在岭南分科大学计划未完成前或既完成之后关于广告或其他事项岭南大学对于本农科大学得称为岭南大学之农科大学）。”并且还强调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所议决的事项必须交由岭南大学执行部执行。^[28] 显而易见，岭南农科大学自始至终都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完全由华人管理，独立于岭南大学之外的农业高等教育机构，而是两种异质文化碰撞后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理想与社会现实冲突与协调的产物。

岭南农科大学作为岭南大学的分科大学之一，虽然有独立的华人董事局负责管理其日常事务及经费筹措，但由于在校舍、校地及教职员任用等各个方面都与岭南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岭南董事局产生矛盾和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不断地协调而最终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这虽然与钟荣光设想建立的一所主权完全在中国人手中，彻底地由中国人管理和维持的农科大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有限自主至少在当时中国教育主权完全为外国人掌控的情境下是一种新的突破，不但对将来岭南大学完全收归国人自办奠定了基础，或多或少起到了“收回岭南之第一步”的作用，而且其教学与科研成果对今后的华南社会经济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 参考招观海《钟校长荣光博士生平事略》，《纪念钟荣光先生特刊》，广州孙中山文献馆藏。

[2] 同注[1]。

[3] 招观海在《钟校长荣光博士生平事略》一文中，将从1899年开始的时期称为钟荣光的重生时期实不为过。此后的钟荣光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个人革除旧习，对家庭则主张家庭革命，释放侍妾与婢女，并供其读书。对世界则取“天下一家”即“大同主义”，并将“基督教主义”与之结合，对国家则无论从事革命事业、新闻事业，还是基督教事业都一如既往地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4] 钟荣光《建国与教育》，《南大与华侨》第1卷第3期，1923年10月，页1—2。

[5] 参考李坚、余齐昭《钟荣光传》，<http://www.lingnan.net/lmj/lmsh/lrxz/zhongl.htm>。

- [6] 参考谭锡鸿《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部》，《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64年。
- [7] 参考“Meeting of the Agricultural Staff”，Reel 1，January 30，1919，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缩微胶卷。
- [8] 参考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页58。
- [9] 《岭南农科大学计划书·布告第一号》，1921年9月刊行，中山大学校史阅览室藏。
- [10] 同注[9]。
- [11] 参考《岭南农科大学董事第十四次会议记录》，38—4—128，“岭大农学院会议记录及年会记录”，广东省档案馆藏。
- [12] 同注[6]。
- [13] 《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条例》，38—4—384，“农学院旧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
- [14] 《岭南农科大学一览》，布告第二号，1922—1923年，中山大学校史阅览室藏。
- [15] 钟荣光《对于岭南大学扩充农校之感言》（转录美洲三藩市中西日报），《岭南农科大学农事月刊》第1卷，第1期，1924年，页12。
- [16] 《蚕桑短期专修科毕业》，《南大青年》第11卷，第17期，1922年11月5日，页12。
- [17] 参考《历届毕业生名册》，38—1—52，广东省档案馆藏。
- [18]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193。
- [19] 《岭南大学年鉴》，1925年，中山大学校史阅览室藏。
- [20] 《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度岭南农科大学报告书撮要》，38—4—128，“岭南农学院会议记录及年会记录”，广东省档案馆藏。
- [21] 黄永安《岭南大学的蚕丝改良机构与广东制丝改良失败》，《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
- [22]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7卷，第10期，1935年1月30日，页127。
- [23] 《演坛——钟荣光先生在美国芝城青年会演说详志》（录1924年1月芝城工商报），《南大与华侨》第2卷第1期，1924年4月，页4。
- [24] 《代论——钟荣光先生致少年报主笔》第2卷第3期，《南大与华侨》，1924年10月，页4。
- [25] 参考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李心光《爱国教育家——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见周肇基、倪根金《农业历史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黄永安《岭南大学的蚕丝改良机构与广东制丝改良失败》，《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以上论文中都有此说法。黎照寰、招观海《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事略》，《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1981年；杨重光《美帝控制岭南大学六十年》，《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以上论文中也曾多次提到钟荣光与美

国纽约岭南董事局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其担任副监督及校长期间，言行受到诸多制约，因而在成立由华人董事局完全控制的岭南农科大学过程中受到阻挠也是不足为奇的。

[26] [美] 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页169。

[27] “Proposed revised By-Laws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as amended and adopted”, November 12, 1922, 38—4—19, “岭大农学院来往信件”，广东省档案馆藏。

[28] 参考《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条例》，38—4—384, “农学院旧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

(作者单位：广州博物馆)